

领域开拓与话语革新：蒋承勇的跨学科研究实践

Field Expansion and Discursive Innovation: Jiang Chengyong'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actice

王一平 (Wang Yiping)

内容摘要：20 世纪中期，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分裂的问题。在对著名的“斯诺问题”的回应中，蒋承勇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自觉引入系统论、心理学等相关知识和方法，将 19 世纪经典文学置于多学科中加以考察，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拓展研究领域，推动研究范式更新。蒋承勇强调 19 世纪作为“科学世纪”的时代特征，揭示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实证方法和类比思维等如何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等的“写实”与“求真”，阐明科学进步、文学思潮与小说兴盛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影响机制。蒋承勇以“人学”为统摄，结合生物学、心理学等现代科学成果，考察“人”的生成与演变，尤其关注 19 世纪“人”被纳入科学话语后的深刻转型，并由此深化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等的研究。在学术实践层面，其通过心理结构分析、系统论模型和文化人格研究等，对司汤达、巴尔扎克、歌德、拜伦等重要作家和作品人物作出了新的阐释。蒋承勇以系统性、跨学科研究为特色，拓展了 19 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为 19 世纪经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推动了其研究范式与学术话语的深度革新。

关键词：19 世纪文学；跨学科；文学思潮；人学；蒋承勇

作者简介：王一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科幻文学等。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 世纪欧洲文学与科学关系研究”【项目批号：23&ZD303】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Field Expansion and Discursive Innovation: Jiang Chengyong'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ractice

Abstract: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he British scholar C. P. Snow raised the issue of the divide between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cultures. In response to this well-known “Snow Problem,” Jiang Chengyong has, since the 1980s, consciously incorporated concepts and methods from systems theory, psycholog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situating nineteenth-century canonical literature within a multidisciplinary framework. Through renewed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 texts, he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research and promoted paradigm shifts in literary

studies. Emphasizing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an “Age of Science,” Jiang elucidates how the rational spirit, empirical methodologies, and analogical modes of thought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shaped realism’s mimetic and truth-seeking orientations. He further clarifi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linking scientific progress, literary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methodological terms, Jiang adopts the study of the human as a unifying framework, integrating modern scientific findings from biology and psychology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ma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that occurred when the human was incorporated into scientific discour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by deepening the study of realism and naturalism. At the level of scholarly practice, Jiang employs psychological structural analysis, systems-theoretical models, and cultural personality studies to offer new interpretations of major writers and literary figures, such as Stendhal, Balzac, Goethe, and Byron. Characterized by systematic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Jiang Chengyong’s scholarship has broadened the academic horizon of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studies,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canonical literature, and achieved profound innovations in both research paradigms and scholarly discourse.

Keywords: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ity; literary trends; the study of human; Jiang Chengyong

Author: Wang Yiping is Professor in Literature at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contemporary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cience fiction (Email: yipingwang@scu.edu.cn).

英国小说家和科学家 C.P. 斯诺 (Charles Percy Snow) 在 1959 年的演讲“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中, 提出了著名的“斯诺问题”, 即“科学文化” (scientific culture) - 科学家和“文学文化” (literary culture) - 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出现的偏见和分裂, 如非科学家认为科学家抱有一种浅薄的乐观主义, 没有意识到人的悲剧性处境; 而科学家则认为文学知识分子缺乏远见, 在深层意义上反知识等。¹ 在人文学界, 虽然斯诺提到的教育分科“专门化”等原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化的某些误解, 但当代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此类问题, 并对此进行了富有意义的反馈: 在坚持人文理念的批判性和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基础上, 众多学者尝试吸收诸学科的知识与方法, 将之合理地运用于相关研究之中。在

1 参见 C. P. 斯诺: 《两种文化》, 纪树立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 第 4-5 页。

文学界,如在19世纪西方文学研究这一重要领域——19世纪也正是所谓的“科学世纪”的时代——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跨学科研究成果。其中,蒋承勇于1980年代在《外国文学评论》发表的“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就已经秉持了跨学科研究的思维,吸收了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方法,运用如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对19世纪的经典作品《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复杂的内在心理进行了分析¹,由此也开启了其对文学思潮中的两种文化、人学研究中的多学科等的长期探索。由此,蒋承勇借助跨学科研究方法等,通过理论思辨、现象分析和作品探讨,完成了对19世纪经典文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拓展、学术范式更新。

一、总体视域：“文学思潮”中的文学与科学

19世纪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是学界常研常新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价值和热度始终未曾衰减。但在1980年代的中国学界,其也面临着研究范式转变、学术话语革新的重大时代需求。而蒋承勇从“文学思潮”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作品展开了深入考察,体现出强烈的系统性、比较性和多学科融合的意识,由此为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创造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蒋承勇赞赏丹麦文学史家、批评家勃兰兑斯(Gerog Brandes)的《19世纪文学主流》(*Main Currents in 19th Century Literature, 1872-1890*),曾在论文中引用该书前言:“如果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蒋承勇,“跨文化”126)。蒋承勇认为,《19世纪文学主流》的重要优点在于其能够对19世纪文学思潮在欧洲各国体现出的不同风格与特点加以分析,归纳提炼出共同特征和规律,由此得以真正勾连起这一时期的诸多经典作家、作品,即该论著,以其系统性和综合性克服了文学史中常见的“简单依序罗列”、“机械设定标签”等弊病,此种研究方式显示了研究的“系统的组织的机制”。²这种内在的“系统”与“比较”意识也使《19世纪文学主流》成为比较文学的早期经典之作。事实上,蒋承勇的著作《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现实主义)》及诸多相关系列论文,也体现了这种史论相结合的学术志趣。当然,勃兰兑斯的研究具有跨国家、多语言的比较观念,而蒋承勇则更多地体现出重思潮、跨学科的融合意识。

在19世纪,工业革命持续推进,如进化论的演进、细胞学说的创立、能量守恒定律、化学原子论和周期律的发现、电磁理论的完成,以及电器时代的到来等³,都使得19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世纪”。而这一时期

1 参见蒋承勇:“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外国文学评论》2(1987):122-127。

2 参见蒋承勇:“跨文化与跨学科: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双维拓展”,《探索与争鸣》6(2022):124-126。

3 参见侯福龙编著:《19世纪科学发展》,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47页。

风起云涌的文学潮流也显然与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在以往的诸多研究中，19世纪的科学发展虽然被视为重要的时代背景，但这种背景如何具体地进入文学创作中，却缺乏较为细致清晰的论证。而蒋承勇则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合理推演。对于社会总体思潮、自然科学的进展如何转化为文学思潮，又如何体现在创作中的机制，作了富有解释力的说明。正如美国学者瓦特（Ian Watt）在《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 1957）中以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等18世纪作家为例，说明了近代个体经验成为现实的最终仲裁者¹，“个人主义”、读者群体与印刷商业等的发展促成小说成为表现现代个人的合适形式，蒋承勇也以左拉、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为例，对科学繁荣和写实小说兴盛之间的影响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索。蒋承勇指出，在19世纪，理性和科学成为人类本性和力量的重要体现；科学表征了人类对自然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把握。尽管存在着如浪漫主义等对此有着较强反思意味的潮流，但科学崇拜之风相当盛行，人们纷纷力图用科学理念与方法去研究人类所面临的一切现象和问题，科学方法的运用也超越了科学领域，观察、推理与实验等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被运用到各个领域，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冲击了形而上的思辨传统。具体而言，跨学科的“类比方法”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²典型者如奥尔巴赫所指出的，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以对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比较开始阐释自己的作品，如比较了士兵、工人、官员、律师之间，以及他们与狼、狮、驴、乌鸦等的区别，即试图用生物学的类比法解释他对人类社会的看法。³也正是这种具有科学色彩的类比思维和分析逻辑，使得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与环境形成了密切关系，人被难以抗拒的环境或“物”所包围：“人物性格与灵魂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环境对性格与灵魂质量的优劣具有决定性作用”（“‘科学的世纪’与文学”87），由此造就了其作品的基本观念和特色。

同时，蒋承勇强调“求真”是一种科学追求，而随着科学主义的发展和渗透，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其它艺术门类——如视觉艺术中，能够忠实准确地（观察）记录实际场景、人物的“摄影术”的发展也促使（真实的）“视觉性”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关注焦点。⁴如学者布鲁克斯（Peter Brooks）所言，现实主义文学重视视觉性。视觉性以对社会和

1 参见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刘建刚、闫建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7页。

2 参见蒋承勇：“‘科学的世纪’与文学的特质——科学与现实主义‘求真’之关系考论”，《外国文学》4（2022）：84-86。

3 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60-561页。

4 参见蒋承勇：“‘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学术研究》4（2022）：157。

生活的细致观察为前提，并将其科学实证式的观察结果演绎为文学作品。尽管小说本身是一种审美式的艺术创造而非对生活现实的实验报告，但读者确实是通过这种以实证性的视觉观察形成的文本来理解人类社会、大千世界。¹而且，这种视觉性的观察不能停留在表面，而更是一种对某种规律或本质的深刻洞察。²因此，“求真”精神成为主要的人文潮流，诸多作家也像科学家那样去研究并认识生活、社会和人，力图再现社会和生活的真实状况。³而小说（尤其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作为这一时代能够最真实、深刻、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类，最好地顺应和满足了此种时代心理和要求。所以，在对科学精神、方法和知识的吸收中，19世纪的众多作家以“求真”之精神、“类比”等方式，把自然科学的知识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大力扩展了小说的题材领域和知识内容，使得作品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理性特征。而作为典型地体现了此种思潮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使文学空前地贴近了现实生活和生活中的人；科学方法与理念也使现实主义文学本身奇特而空前地拥有了社会研究的实证性求真之特征”（蒋承勇，“‘科学的世纪’与文学”86-89）。而伴随着源自新科技的印刷技术、图书出版等新媒介的迅速发展，现实主义小说也随之繁荣。当然，蒋承勇也指出了此种具有类比色彩的“写实”“求真”的局限性。许多19世纪作家接受了代表时代精神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却并未认识到科学和文学尽管有互通之处，但文学艺术却并非以求真为目标。文学作品虽然可以采用实证和逻辑演绎的方法，但其方式是描述的、想象的、感性的，不可能脱离想象与虚构；而且其最终目的是“求美”，获得审美价值。⁴由此，蒋承勇完成了对从科学革命-社会思潮-文学创作-文学潮流的发生、发展、演化的具体过程的推演，合理解释了19世纪同时成为“小说世纪”和“科学世纪”的内在因由；也以其宏阔的视野、充分的理论自觉、缜密的考证和合理推演，破除了“斯诺问题”中两种文化的隔阂，积极推动了19世纪经典研究的范式转换和话语革新。

二、研究路径：以“人学”统摄跨学科研究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由于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也进入了自19世纪的工业革命、科学革命之后的又一大根本性变革时期。而在学界，也形成了极受瞩目的所谓“后人

1 参见蒋承勇：“科学精神催生‘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报》2022年5月5日，第005版。

2 参见蒋承勇：“科学与文学理念之现代性转型——现实主义‘写实’特质成因考论”，《社会科学》11（2021）：176。

3 参见蒋承勇：“‘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学术研究》4（2022）：155-156。

4 参见蒋承勇：“‘科学的世纪’与文学的特质——科学与现实主义‘求真’之关系考论”，《外国文学》4（2022）：92-94。

类”(posthuman)问题。然而,理解该现象或论域的核心症结还在于,“后人类”之中所谓的“人”及“人文主义”等究竟为何。或者说,要探索所谓的“后人类”,即“人类之后”的未来前景问题,首先仍要厘清其所针对的对象,即“人”究竟何为。因此,重新思考与理解近代以来的“人”,便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19世纪也是“人”被发现、发明的世纪。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1966)中指出,在19世纪,“人”成为“依据经济学、语文学和生物学的法则而生活、讲话和劳动的个人”(314)——一个由劳动、语言、生命的交叉组成的复合体。“生命哲学把形而上学揭穿为幻想之幕”(福柯 321),“人”被纳入科学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之中,变成了可以分析、检验的实体,被“发明”为科学的对象。而蒋承勇在学术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方面,正在于所谓的“人”的产生、发展、前景等,尤其关注19世纪的“人学”转变。

蒋承勇的《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囊括了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20世纪的西方经典著作,但并未局限于对作家、作品的评介和分析,而是以最关键的基本问题即“人”的演变为核心,从“文学是人学”、“文化-文学-人”的一体性展开关于“人”的文学研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从人的欲望与理性的对立与互补谈起,由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时代以来人对上帝的追寻、向自然和感性世界的迈进,以及向理性世界的退守和上帝的失落等,对西方文学潮流和经典作品进行了统贯性的研究。在科学时代以后,人的“生产”、研究的视角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在该著作的第一章,作者虽然由对《圣经·创世纪》的讨论开始,却并未局限于常规的对“禁果”的基督教文化意义的阐释,而是由对动物的生物心理机制的说明,提出了人类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解剖学、考古学对人脑的研究和发现等展开论说——由于人类脑容量的增加,脑结构如前额区的进化等,人出现了如猩猩等并不发达的新皮质;人由高度发达的额叶组成了大脑的特殊结构:语言中枢区、大脑皮层第二机能联合区、第三技能联合区,这也是人类的心理、意识等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发生了由动物心理结构到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发展和变化。¹因此,蒋承勇吸收了现代社会对“人”的科学化研究的成果,并将之融入人文学科观察中,展开了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创造的关联的重要研究。

此外,蒋承勇也强调了现代“人学”对文学和科学的统摄及其在文学中激荡出新潮流:文学是“人学”意味着文学是对个体感性生命的关照和关怀,而作为现代“人学”的基础学科,生理学也是以体现为肉体的个体生命为研究对象;19世纪中后期生理学等的诸多重大发现和假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文化反响,如血肉、神经、能量、本能等对人进行描述的生理学术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语汇,一种新型的现代“人学”在生理学发现的

1 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0-11页。

推动下形成；而西方文学和现代生理学等在“人”身上的交汇，则形成了自然主义文学运动。¹由此，蒋承勇进一步从“生物的人”等视角对左拉等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作家进行了历史考察，包括左拉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其他遗传学理论的大力吸收和演绎等，并深入探讨了“把人还原为生物”的思潮，解释了“人的生物性”带来的非道德化倾向以及对未来20世纪文学的非理性主义的催化。除此之外，《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也关注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赫胥黎等对动物的论述，在探讨巴尔扎克等作家时也从其受到动物学的启发而展开。而在“人的定位”部分，作者也用具有张力的动物和上帝视角来理解“人”，如从尊严、野性等角度探讨“人是‘虫’？”“人是‘兽’？”²总之，蒋承勇在文学研究中对科学主义的关注，呼应了福柯提出的人被生命、劳动、语言的相关科学捕捉的知识型转折，体现出文本内外结合的跨学科研讨思路，丰富和深化了相关研究。

因此，如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学者在后人类问题上强调其所针对的是传统或经典的“大写的人”（33），即一个“代表了正态、常态和规范性”、“通过将作为人的具体模式转化为一个一般化的标准”的人（36），而蒋承勇的“人学”中的“人”及其所强调的方面则与这种不变的、排他的“人”颇为不同。蒋承勇的研究首先就在于对“人”的转变、人的多面性的强调，其次是对人文主义中有价值的面相的肯定，如对人的生命意志、自然欲求等的承认，再次则是强调变化中的人这一形态的延续性而非断裂性，包容性而非分裂性。蒋承勇的文学研究中的人与后人类学者们所抨击的“标准的人”并非完全是同一种“人”，而是有所错位、各有重点。因此，在当代的“后人类”理论热潮中，蒋承勇所代表的经典研究对于学界回到基本的“人学”问题，锚定价值基点、厘清相关概念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学术实践：跨学科研究的多学科展开

蒋承勇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跨学科研究，还自觉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开展了丰富的学术实践。自1980年代以来，他对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福楼拜、劳伦斯、塞万提斯、歌德、莎士比亚、拜伦、易卜生等的作品展开了研究，并体现出了对心理学的高度关注和运用。早在1987年，他借助系统论“自组织”的思路，把于连的性格元素列为“确立自我、刚强坚毅、向往民主、自尊、反抗、虚伪、雄心勃勃与野心勃勃”，并将之按三个等级层次进行组合：由确立自我而发展出刚强坚毅、向往民主，进而发展出其他层次。³于连的个性正是在内

1 参见蒋承勇：“‘重返19世纪’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更新——以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为例”，《浙江社会科学》10（2021）：137-138。

2 参见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1-381页。

3 参见蒋承勇：“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外国文学评论》2（1987）：123。

部束力和外部环境迫力的共同作用下进行自组织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而“以任何复杂形式和复杂程度为初始状态，一个系统会使自身复杂化，以适应来自环境的输入”（“以系统” 124），随着三次重大的环境变化，于连的心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反抗性元素成为对整个系统起控制作用的元素，造成性格系统的崩溃，也造就了故事的最终结局。这一视角非常具有启发性，为理解于连这一典型的复杂人物提供了新思路。1991年，蒋承勇在论文“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中指出，以往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研究过于强调外部因素，而很少从内在心理因素的视角去挖掘作家的创作个性。¹此后，蒋承勇又在“《人间喜剧》：物质世界后面还有一个心灵世界”中借助荣格的“图式”和巴尔扎克本人的经历和其投射出的时代精神，对其美学特点进行了辨析，提出他具有外向型审美心理机制，因此展现出独特的深刻性。²而在“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中，蒋承勇则指出狄更斯带有儿童心理特征的主体心理原型过滤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主观表现性。³同样，在“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中，蒋承勇也从内在精神世界的角度分析了歌德及其笔下的浮士德，指出歌德既要挣脱宗教规范的约束，也要摆脱世俗生活的束缚，体验生活的欢乐与悲苦，浸泡在庸俗乃至鄙俗之中，体味多姿多彩的人生体验；不可遏制的生命意志和自然欲求推动着歌德并造就了他复杂的人格，使其创造出浮士德这一充满自然欲望而又充满内在矛盾的欧洲“近代人”典型。⁴而在“‘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拜伦文化价值论”中，蒋承勇也关注了拜伦的心理秉性，激情、放纵与“自然人”的心理秉性使拜伦采用了无拘无束的情感生活方式，自尊、反抗、狂暴等秉性使他憎恶一切压制人性的外在权威和社会制度，反抗与“自然人”秉性使他性格率真、蔑视虚伪的道德，而仇恨、狂暴、孤傲的秉性使他在反抗强权、企求人类之爱时，又在孤独无助时产生极端的恨，陷入悲观与绝望——三重心理秉性互相关联、制约，共同作用决定了拜伦的文化人格。⁵因此，蒋承勇对作家、作品人物的心理人格等的聚焦性关注，其不同于传记式研究的独到分析，为学界提供了理解这一时期经典作品的跨学科新视角。

1 参见 蒋承勇：“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1991）：320。

2 参见 蒋承勇：“《人间喜剧》：物质世界后面还有一个心灵世界”，《社会科学战线》4（1992）：288。

3 参见 蒋承勇、郑达华：“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1995）：73。

4 参见 蒋承勇：“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2007）：116-117。

5 参见 蒋承勇：“‘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拜伦文化价值论”，《外国文学研究》6（2010）：57。

此外，蒋承勇还关注因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的“求真”“写实”潮流之中，文学理论的相应发展，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对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Hippolyte Taine)的探讨。丹纳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的影响，他认为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个人，各类艺术只能在特定的精神环境中才能产生，正如“从南方向北方出发，可以发觉进到某一地带就有某种特殊的种植，特殊的植物”，而这种繁育植物的不同“地域”，“相当于我们在另一方面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况”（“艺术品”464）。从这一角度看，“美学本身便是一种实用植物学”，因此人们要像研究植物一样研究美学——这表现出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日益接近的潮流”（丹纳466）。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吸收了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方法和解释机制，丹纳提出了著名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说。对此种理论，蒋承勇也以一种符合科学观念的实验方法——对理论加以实践检验方式的测试其合理性。蒋承勇从丹纳的视角还原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时代及其风尚：在三要素中，种族和环境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而时代既是指文学外部的社会精神气候，也指文学内部的传统，这两者变动不居，会使不同国家的文学“忽而发展理想的精神”（如浪漫主义），“忽而发展写实的的精神”（如现实主义），并产生不同的“艺术宗派”（如文学思潮的更迭）。而从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来看，也正是19世纪欧洲特定的科学精神与时代风尚，造就了为数空前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汇聚成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潮。¹由此可以看出，丹纳的三要素说虽然无法解释所有文学现象，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具有说服力的。

蒋承勇自1980年代以来就深耕于19世纪西方文学经典研究领域，其主要的学术特色十分鲜明：一是进行文学总体研究的系统性。蒋承勇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总体观照和系统研究的学术自觉，尤其体现在即使是在探讨个别作家、阐释具体作品时，其始终彰显出内在的文学史意识，即其始终将作家、作品置于错综复杂的文化网络、文学潮流中的某个节点或位置，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价。而此种学术意识或许与蒋承勇也编写了多部有影响力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有关：如《英国小说发展史》《西方文学名著导引》《外国文学教程》等。如其所指出的，各类文学史往往呈现为作家列传和作品介绍，缺乏有深度的阐释，同时存在用狭隘的文学史观去论定作家、作品的现象²，而蒋承勇则以其总体性的宏观视野，用将思潮和作家、作品研究紧密结合的方式，对19世纪经典研究进行了开拓和深化，可以说以实践完成了学界倡导的“重写文学史”。二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引领性。近年来，随着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内部的持续交流与融合等，跨学科研究受到了学

1 参见蒋承勇：“科学与文学理念之现代性转型——现实主义‘写实’特质成因考论”，《社会科学》11（2021）：175。

2 参见蒋承勇：“总序”，《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页。

界的高度重视，而蒋承勇是其中重要的先行者。蒋承勇曾提出“现实主义研究之十大问题”，第一条即为“现实主义与自然科学”¹，可见其对学科交叉现象的深刻观察和高度重视。而蒋承勇不仅在观念层面提出此类问题，也在具体的作家研究、作品阐释中充分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在共同的人学关注、共通的思想源流之下，其运用了心理学、生物学、哲学等相关知识展开研究。蒋承勇既有力地打破了斯诺所提出的“两种文化”的隔阂，也完成了对19世纪经典研究的传统话语、范式的革新，以其长期的实践为建构原创性的学术话语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Works Cited

-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吴麟绶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Wu Linshou et al.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 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translated by Song Gencheng. Zhengzhou: Henan UP, 2016.]
- 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 [Foucault, Michel.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lated by Mo Weiwen.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侯福龙编著：《19世纪科学发展》。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 [Hou Fulo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inan: Shand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7.]
- 蒋承勇：“‘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拜伦文化价值论”，《外国文学研究》6（2010）：55-63。
- [Jiang Chengyong. “The Byronic Hero and the Archetype of Superman: On Byron’s Cultural Value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0): 55-63.]
- ：“‘科学的世纪’与‘小说的世纪’——自然科学与现实主义小说之关系考论”，《学术研究》4（2022）：154-161。
- [—.“‘The Century of Science’ and ‘The Century of Fiction’—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Realistic Fiction.” *Academic Research* 4 (2022): 154-161.]
- ：“‘科学的世纪’与文学的特质——科学与现实主义‘求真’之关系考论”，《外国文学》4（2022）：83-96。
- [—.“‘The Century of Scienc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Truth-Seeking of Realism.” *Foreign Literature* 4 (2022): 83-96.]
- ：“审美心理机制的差异性与反映生活的不同取向——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认识”，《社会科学战线》1（1991）：320-328。

1 参见蒋承勇：“‘说不尽’的‘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0（2021）：123。

- [—.“Differences in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Divergent Orientations in the Reflection of Life: An Understanding of Nineteenth-Century Realism.” *Social Science Front* 1 (1991): 320-328.]
- ：“《人间喜剧》：物质世界后面还有一个心灵世界”，《社会科学战线》4（1992）：288-292+76。
- [—.“*La Comédie humaine: Beyond the Material World There Exists a Spiritual World.*” *Social Science Front* 4 (1992): 288-292+76.]
- ：“‘重返 19 世纪’与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更新——以西方文学思潮研究为例”，《浙江社会科学》10（2021）：135-142。
- [—.“The Discourse Renovation i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Taking the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the 19th Century as an Example.”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10 (2021): 135-142.]
- ：“浮士德与欧洲‘近代人’文化价值核心”，《外国文学评论》2（2007）：115-123。
- [—.“Faust and the Essential Cultural Values of the European ‘Modern Individual’.”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2007): 115-123.]
- ：“总序”，《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现实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19 页。
- [—.“General Preface.” *Studies on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Realism)*. Beijing: Peking UP, 2022. 1-19.]
- ：“‘说不尽’的‘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战线》10（2021）：120-132。
- [—.“The ‘Inexhaustible’ Nature of Realism.” *Social Science Front* 10 (2021): 120-132.]
- ：“跨文化与跨学科：西方文学思潮研究的双维拓展”，《探索与争鸣》6（2022）：123-131。
- [—.“Intercultur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the Two-Dimensional Expans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ought.” *Exploration and Free Views* 6 (2022): 123-131.]
- ：“科学与文学理念之现代性转型——现实主义‘写实’特质成因考论”，《社会科学》11（2021）：171-178。
-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Literary Thought: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Realism’s Mimetic Character.” *Social Sciences* 11 (2021): 171-178.]
-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 [—.*The Motif of “Man” in Western Literatur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8.]
- ：“以系统的自组织原理看于连性格的自在性与自主性”，《外国文学评论》2（1987）：122-127。
- [—.“On the Spontaneity and Autonomy of Julien Sorel’s Charac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Self-Organization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2 (1987): 122-127.]
- ：“科学精神催生‘写实’‘求真’的现实主义”，《社会科学报》2022 年 5 月 5 日，第 005 版。
- [—.“The Scientific Spirit as the Catalyst for Realism’s ‘Mimesis’ and ‘Truth-Seeking’.” *Social Sciences*

Weekly 5 May 2022: 005.]

蒋承勇、郑达华：“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1995）：69-73。

[Jiang Chengyong and Zheng Dahua. “Dickens’s Psyc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the Fairy-Tale Mode of His Fiction.”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1 (1995): 69-73.]

C. P. 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Snow, C. P. *The Two Cultures*, translated by Ji Shuli.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丹纳：“艺术品的本质”，《十九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英法卷）》，蒋孔阳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58-475页。

[Taine, Hippolyte. “The Nature of the Work of Art.” *Selected Nineteenth-Century Western Aesthetic Classics (English and French Volume)*, edited by Jiang Kongyang. Shanghai: Fudan UP, 1990. 458-475.]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研究》，刘建刚、闫建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translated by Liu Jiangan and Yan Jianhua. Beijing: China Renmin UP, 2020.]